



▲商祈雨甲骨刻辞残片。

◀王国维与罗振玉(右)

自比墨子却深陷泥淖 罗振玉：一生复杂且可惜

□云韶

最近,位于北京的鲁迅博物馆搞出了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该馆举办了一场“国学大师罗振玉学术成就展”。虽说展品大多属于国宝级别,但考虑到鲁迅与罗振玉的关系,不得不说,这次同框,让人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鲁迅先生曾经抨击过罗振玉,说他的学术研究有一股“广告”的气息。尽管鲁迅先生对罗振玉的治学方法有微词,但从古文字以及古器物研究的角度来说,罗振玉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罗振玉,同治五年(1866)出生在江苏淮安。其父名叫罗树勋,曾先后任江宁、清河县丞。自小衣食无忧的罗振玉15岁就考上了秀才,可随后连续两次乡试都名落孙山。接连的失败,让罗振玉认清了现实。在第二次乡试落第后,他找到一份乡间塾师的工作,教书养家。回顾罗振玉的一生,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他最为惬意的时光,没有世事的烦扰,没有琐事的羁绊,眼所及不过闲琴野鹤,耳所闻只有书声琅琅,每天与顽童相伴,时时有经典诵读。

但这种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国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时局的动荡,很快波及到了罗振玉。他是一个读书人,读的是儒家经典,受的是孔孟教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今政府罹难,百姓受灾,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一种士大夫的责任,呼唤罗振玉站出来,用自己的力量救国救民。

诚然,以后罗振玉的人生道路走偏了,成为了千夫所指的汉奸走狗,万夫唾骂的封建余孽。但此时的罗振玉,确实怀着一颗救国救民之心,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人性是复杂的,认识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脸谱化,有功就无限神化,有劣迹则使劲贬低,这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观,实为学习历史的大忌。

说回罗振玉。他在甲午战后的第二年出山,先是与蒋伯斧合作,在上海办了弄学社,并创刊《农学报》,从事搜集翻译农学著作的工作,力图实现“科技救国”。由于缺乏翻译人才,罗振玉在1898年6月创办了东文学社,请日本人藤田丰八以及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人员在社中任教。社中只有六名学生,其中便包括王国维。罗振玉很欣赏他的才识,两人遂结下终生之交。

也就在这个时候,罗振玉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因为出身小官僚的家庭,囿于阶级的局限性,他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导的戊戌变法十分反感。至于康有为、梁启超两人,罗振玉更是非常厌恶。阶级的对立,禁锢了罗振玉的进步思想,思想的局限,蒙蔽了罗振玉的救国之心。自此,他

化身顽固派的得力干将,成为了阻碍中国进步的一分子。

罗振玉的政治态度,得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的赏识。1901年,经两人举荐,罗振玉获得了去日本考察教育的机会。在日期间,他与日本政客小村寿太郎、近卫笃磨、长冈护美等人交往频繁。就在这段时期,罗振玉的思想再度滑坡,他把拯救清政府的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人身上,对于日本劝诱清政府在东北另立“满蒙帝国”的计划,罗振玉不但没有反对,反而为其四处奔走。这表明,罗振玉已经彻底堕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罪人。

罗振玉回国之后,先是任南洋公学虹口分校的校长,随后受江苏巡抚端方委托,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此后他官职步步高升,曾一度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在此期间,他曾奏请学部购运敦煌石窟的古文物。这些文物史料后来有相当部分转入他手中。宣统年间,罗振玉大力搜购安阳出土的甲骨,先后得三万余片,这是他以后从事古文字以及古器物研究的重要条件。

当然,罗振玉发达了,并没有忘记王国维。1903年,经罗振玉的介绍,王国维到张謇办的通州师范学堂任职,在这里供职一年多后,接着在苏州学堂任职。

1906年,罗振玉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王国维又跟随罗振玉一家在京城谋生,由罗振玉在学部为他谋了一个职务,并让他住在自己家中,这样既可共同探讨学问,还可以让家中仆人照顾王国维的生活。在京城供职的两三年内,王国维先后失去了父亲、妻子,继母三位亲人,这使得他悲痛欲绝,幸好有老朋友罗振玉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感到这个世界还有几许温情。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同王国维带着家眷,于12月初逃到了日本京都,成为了亡命遗臣。在日本期间,罗振玉利用他的大量收藏,先后著录《殷虚书契前篇》、《后篇》及《殷虚书契精华》等书,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虚书契考释》与《流沙坠简考释》。罗振玉治学有个习惯,每搜购一批古文物,经过考校,出书之后便卖掉,然后再买一批,如此反复。所以鲁迅说他是:“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

1919年春,罗振玉自日本归国。五年之后,他应溥仪的邀请,“入职南书房”。与王国维一起检视官中器物。就在这个时候,罗振玉与王国维间生嫌隙。当时和罗振玉同值南书房的,还有一批遗老。正所谓有人地方就有斗争,小小的南书房也成为遗老们的争斗之所。随着这些人的矛盾逐渐激化,王国维不想自己成为棋子的态度,让罗振玉渐生不快,两人的关系就此出现了裂痕。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罗振玉与陈宝琛经过苦心策划,将溥仪偷偷地护送到了日本使馆。在日本人的庇佑下,溥仪得以在天津日租界的“张园”住下,罗振玉因“护驾有功”,成为了“顾问”,可以时常出入张园。罗振玉的“飞黄腾达”引起了其他遗老的妒忌,很快谗言便进入了溥仪的耳中,无奈之下,罗振玉只得迁居旅顺,暂避风头。

而就在这个时间段里,罗振玉和王国维彻底绝交。两人本是儿女亲家,罗振玉的三女儿罗孝纯嫁给了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没承想,王潜明在年仅26岁的时候便撒手人寰。罗振玉前来吊唁,在女婿入殓后,竟不告而别地带走了自己的女儿。正为中年丧子而极度伤心的王国维对自己的知己、儿女亲家罗振玉无缘由地带走自己的儿媳,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

在儿子故去的善后处理方面,王国维与罗振玉再次产生矛盾。王国维为儿媳罗孝纯的将来考虑,把海关所给的抚恤金全部寄给罗孝纯,然而罗家却出乎意料地拒绝接受抚恤金。王国维几次把汇票寄去,几次又被退了回来,最后罗振玉竟写了一封绝交的书信寄来。

在这份绝交信中,罗振玉以崇尚博爱的墨子来比喻自己,指出自己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无私援助王国维,从来没有怨言,却把王国维比作主张“重己”的先秦哲学家杨朱,认为王国维很自私,知恩不报。

双方的矛盾自此不可调和,两人三十多年的友谊就此终止。后来,罗振玉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特别是当他接到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消息后,更是痛不欲生,直呼:“静安(王国维的字)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向与日本政客有勾结的罗振玉,认为复辟帝制的时机已到,便去往日本军部游说。他就此成为了帮助日本分裂中国、炮制成立伪满洲国的重要人物之一。1932年,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任罗振玉为伪参议府的参议,后来又任命他为伪监察院长。伪满洲国实行帝制后,罗振玉受到了“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7年6月,罗振玉退休,此后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1940年6月19日,病逝于旅顺。

回首罗振玉的一生,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复杂”。从学术上来看,罗振玉可谓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对甲骨文学、考古学、敦煌学有着突出的贡献。但从政治上来说,罗振玉又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他思想保守,对内顽固守旧,对外卑躬屈膝。这样复杂的人,其实在清末也有很多,他们不是没有才干,只是不知时务,没有眼界,缺乏胆识。这样的人最终坠入泥淖,实为可惜。

□范乡之

2001年2月9日,《齐鲁晚报》曾刊发一篇报道——《辽宁惊现范仲淹家谱》。我看到其中描述的文字记载与我少年时在家中看到的《虞邑范氏族谱》序言中所述大致相同,就将文章剪下保存。

今年春节期间,收到从河南商丘寄来新续的《虞邑范氏族谱》。这部范氏族谱完整系统地记载了从范仲淹的先祖范隋、父亲范墉、儿子范纯仁、孙……一直到公元2012年,三十余代人的延续过程,从未间断。苏州范氏系字谱是范仲淹于皇佑元年(1049年)与苏州族人共同制定的,共20个字:“仲纯正直公,良士宗文伯,叔子希昌彦,友善可弥安。”范仲淹62岁时,于皇佑二年(1050年)正月初八在青州写成《续家谱序》传世。后来苏州族人五服内在朝举官者16人,以16人官名分为16房。范氏16房的后裔散布在全国各地。

范仲淹与河南商丘虞城有特殊的情缘。他青年时期在应天书院读书五年,中进士后又在应天府(今商丘)做官,应晏殊之邀主持应天书院多年,为后世培养了众多人才。宋仁宗天圣五年进士科的状元王尧臣、探花赵概都是他的学生,也都是虞城人。一次殿试前三名,被虞城一县夺其二,是何等不易,这都是范仲淹辛勤培育的结果。虞城名仕王砺、王洙、王尧臣祖孙三代都与范仲淹有深交。范仲淹在应天府娶妻生子,他的长子纯佑、次子纯仁都在这里出生。范仲淹又将老母亲接来奉养。母亲去世后,又为母亲守孝三年。宋代各级官员的俸禄,由官府按职位高低批给若干田地,叫职田。应天府辖区内的宁陵、虞城都有范仲淹的职田。虞城有范氏族人管理职田。金人南侵,范氏族人南迁故里苏州。

虞城范氏家族,是范仲淹在中原的重要支脉,系范仲淹的直系后裔。据《虞邑范氏族谱》记载:仲淹公生四子,长子纯佑,次子纯仁,三子纯礼,四子纯粹。而虞城范氏始祖,乃文正公次子忠宣公之后。其相沿世系是:文正公一传忠宣公,二传正路公,三传直业公,四传公义公,五传良臣公,六传士正公,七传宗聪公。

忠宣公范纯仁的六世孙范宗聪,于元末明初携次子范文理从苏州吴郡返迁河南虞城。其后尊范宗聪为虞邑一世祖。繁衍生息,枝叶分布,至今传承27世,族众达三万余,分布在虞城、砀山、鹿邑、单县、曹县等100多个村镇。范氏族人,立业于耕耘,传家以忠厚,科第蝉联,忠孝节烈,代不乏人,其为官为宦,执教为文,皆秉承祖功宗德,嘉言懿行。牢记文正公“先忧后乐”之教诲,尊仁、义、礼、智之训良,守忠孝节烈之要旨,行急功好义之能事,成为虞城之名门望族。明清两代出进士5人,举人14人。

虞城人范志完进士出身,明代末年曾任蕪州永平、山海关诸州总督,战功显赫,是继戚继光之后的抵抗外敌的民族英雄。受奸人诬陷,被崇祯皇帝处死,后经族人和群臣申诉得以平反昭雪,至今当地仍广泛流传着崇祯皇帝为范志完赐金头的传说。山海关老龙头有他的塑像,与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并列。

明代天启年间,由任兵部左侍郎的范志完、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的范彦良、任蕪州兵备道的范志懋呈请朝廷恩准在虞城县城内建立了范文正公祠,明末毁于战乱,清康熙年间重修。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周围各县的范氏族人都派代表来参加祭祀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此设立虞城县第二完小。

特别珍贵的是谱中收录有范仲淹初续家谱时留下的序言和宋仁宗听说范仲淹筹划修家谱,在宋庆历六年(1046年)主动为范仲淹写的《范氏族谱序》,是宋仁宗唯一一次给当朝大臣的家谱赐序。正是因为《虞邑范氏族谱》记载有珍贵的历史资料,对研究范仲淹和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明清以来历次续修的版本都被广为收藏。2012年版被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苏州天平山管理处等收藏。

【短史记】

范氏族谱里的「先忧后乐」

